

學術對談

## 東西方之間的批判傳播研究： 道路、問題與使命

對談人：趙月枝、邱林川、王洪喆

統稿：邱林川、王洪喆



趙月枝教授  
(Prof. Yuezhi Zhao)

「我們強調歷史的開放性、現實的多重可能性，尤其是不同政治經濟和文化形式在碰撞的過程中產生新的、解放性的文化形式的可能性。我堅信學者有秉承社會良知，展示思想力量的天職。」

---

邱林川，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研究興趣：信息傳播技術、社會階級、全球化、中國社會、傳播政策。電郵：[jacklqiu@cuhk.edu.hk](mailto:jacklqiu@cuhk.edu.hk)

王洪喆，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候選人。研究興趣：信息技術政治、批判的互聯網研究、階級文化與空間政治。電郵：[whzh@cuhk.edu.hk](mailto:whzh@cuhk.edu.hk)

---

Dialogue

## **Cr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Trajectory, Problematics, and Destiny**

Discussants: Yuezhi ZHAO, Jack L. QIU, Hongzhe WANG

Editors: Jack L. QIU, Hongzhe WANG

---

### **Abstract**

In a far-ranging trans-Pacific academic dialogue, award-winning scholar Yuezhi Zhao critically reflected on her own intellectual trajectory in pursuing groundbreaking research on media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he Western, global, and Chinese contexts. In the discussion, she intertwined her personal intellectual biography with China's post-revolutionary history, the political economy and cultural politics of China's post-Mao transformation, and the concomitant developments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both North America and China. Zhao, who charted a critical research path to address the historical erasures and social biase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ommunication scholarship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Western-centric biases of critical communication scholarship on the other, delineated the relevance and intellectual politics of rediscovering “class” as an analytical category in the current Chinese context.

---

Jack L. QIU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Research interests: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s), social class, globalization, Chinese society, communication policy.

Hongzhe WANG (Ph.D. Candidat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Research interests: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history, culture, and class-related issues.

In addition, she argued for the centrality of the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and ecological perspectives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s well as outlined the unique contributions of the trans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 that she has pioneered.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Qiu, J. L. & Wang, H. (Eds.). (2014). Cr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Trajectory, problematics, and destiny.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8, 1–21.

## 趙月枝教授簡介

趙月枝，博士，教授，西蒙弗雷澤大學全球傳播政治經濟學加拿大國家特聘教授(Canada Research Chair in Political Economy of Global Communication, Simon Fraser University)，中國傳媒大學教育部長江學者講座教授。

1965年出生於浙江省縉雲縣，1980年考入北京廣播學院新聞系(現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學院)，1984年畢業，同年考取國家公費留學資格，派往加拿大學習。1986年開始在加拿大西蒙弗雷澤大學傳播系攻讀研究生學位，並分別於1989年和1996年獲碩士和博士學位。1997年至2000年在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傳播系任助理教授，2000年9月重返加拿大母校西蒙弗雷澤大學傳播學院任教。2003年獲西蒙弗雷澤大學終身教授職位，2004年獲西蒙弗雷澤大學全球傳播政治經濟學加拿大國家特聘教授職位，同時獲加拿大國家創新基金在該校建立全球媒介監測與分析實驗室並任實驗室主任至今，並分別於2009-2010年和2011-2013年出任所在傳播學院副院長。2009年起受聘中國傳媒大學教育部長江學者講座教授，2010年應邀任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當代馬克思主義新聞與傳播研究中心兼職學術主任，2013年建立中國傳媒大學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所並出任所長，同年出任加拿大西蒙弗雷澤大學和中國傳媒大學合辦的國際傳播雙碩士學位項目加方創辦主任，並受聘成為加拿大國家智庫亞太基金會(Senior Fellow, Asia Pacific Foundation of Canada)高級研究員。

趙月枝教授的主要研究領域為傳播理論與社會理論、傳播政治經濟學、國際傳播、傳播政策、文化產業、傳播技術與社會發展等。除了在國內多所大學有學術兼職外，她在國外的主要學術兼職包括中華傳播學會(海外)研究主席(2000-2002)，加拿大西蒙弗雷澤大學斯邁思基金會國際諮詢委員會主席、斯邁思年度講座召集人(2004-2012)、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名譽研究員、北歐亞洲研究院(Nordic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名譽研究員，英國倫敦大學全球媒體與民主研究中心國際學術顧問委員會委員等。趙月枝教授還是英文國際學術刊物《全球媒體與傳播》(*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創刊

主編之一，英文國際學術刊物《亞太事務》(*Pacific Affairs*)的編委會執委，以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Javnost*、*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傳播與社會學刊》等十多種中外國際學術刊物的編委和美國依利諾伊大學出版社的*Geopolitics of Information*叢書、北京大學出版社的「傳播政治經濟學」譯叢、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的「批判傳播研究」書系的主編之一。

ZY：趙月枝

QW：邱林川、王洪喆

**QW：**恭喜您獲得國際學界兩項重要獎項<sup>1</sup>。這兩個獎，您都是首位華裔獲獎者，其中一項您還是首位非英美背景的女性獲獎者。這對您從事傳播研究有何意義？

ZY：謝謝。我沒把學術榮譽看得很重，但幾乎同時得到北美批判傳播學組織UDC和國際傳播學會ICA的獎，的確驚喜。「斯邁思」獎旨在獎勵在傳播民主化理論與實踐方面有貢獻的學者。「貝克」獎也是獎勵在媒體、市場、和民主研究方面有建樹者。兩者都聚焦傳播和民主，這也恰是我最核心的研究。在此問題上，我從研究西方和全球層面開始，而後研究中國。理論上，我努力超越把中西方割裂開的東方主義和冷戰思維，對把資本主義自由民主當作「歷史終結」的線性史觀存疑。研究方法上，我力圖尊重現實的多重性和多面性，分析和理解那些被庫恩稱為能挑戰現有範式的「非常規」現象，即那些沒被看見、被人視而不見、或刻意遮蔽的現象。

在對北美的研究中，我與Hackett合著的《維繫民主？新聞客觀性與西方政治》分析了西方自由主義媒體理論和以客觀性為核心的新聞專業主義所面臨的侷限和危機。在全球傳播研究中，我們的《民主化全球傳播：一個世界，多種鬥爭》，不僅繼承了當年國際傳播新秩序運動的著名願景《一個世界，多種聲音》，且強調民主化是一個世界性的歷史進程：它在多場域以不同形式展開，如交響樂同一主題的多重合奏與變奏。在研究中國時，我直面中

國革命史及其激進民主實踐，並從建設社會主義民主傳播的視角，批判分析中國媒體市場化與民主化的關係。雖然兩個獎是給我個人的，但也是給所有敢於挑戰西方自由主義傳播與民主理論框架、所有關照中國歷史和現實的複雜性和多重性的傳播學者。

**QW:** 能談談您與斯邁思的淵源嗎？您在加拿大留學時是否接觸過他？什麼力量推動您從事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

**ZY:** 我跟斯邁思的學術關係有偶然也有必然。1984年我考上了國家公派留學去加拿大。當時美國主流傳播學已經引進，但不了解加拿大。因多倫多大學等加拿大知名學府沒有傳播學課程，我曾要求主管部門改派美國，但被拒。我於是選擇了從未聽過的西蒙弗雷澤大學(Simon Fraser University)，因其設有傳播學博士課程。不想這就是斯邁思創立的加拿大最有國際影響的傳播研究重鎮。不過當時，斯邁思已退休，只教本科生課。當我向一位來自中國大陸的學姐請教，應該跟哪些教授學習時，她警告我遠離斯邁思，「因為他是左派，對中國有錯誤觀點」。不久，斯邁思請我吃午餐，並把他那篇有關中國的〈自行車之後，要什麼？〉<sup>2</sup>給了我，從而強化了我有關中國發展和探索社會主義道路前景的問題意識。

當時，冷戰即將結束，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已經崛起。在傳播學界，文化研究是熱門，政治經濟學在西蒙弗雷澤有些青黃不接，沒人開政治經濟學研究生課程。但我旁聽了斯邁思為本科生開的國際傳播政治經濟學課。後來，等我博士課程學分修滿後，終於有位教授開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生課程，我又旁聽了這門課。實際上，我在西蒙弗雷澤接受的是政治經濟學、文化研究和批判技術哲學相互關聯、不可分割的批判傳播研究理論傳統。直到我到加州任教，才有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學科身份」認同。不過，為了避免政治敏感，也考慮到政治經濟學的廣泛內涵，傳播政治經濟學在加大聖地亞哥分校傳播系被稱為「傳播作為社會力量」(Communication as Social Force)。這使我明白，任何學科名稱有其特定內涵和必要性，但也有其侷限。具體研究中，學科邊界必需打破，進行「跨界」研究。所以，我不是主動「選擇」政治經濟學，而是在中國大學積累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上，加上在北

美求學和任教經歷，「自然而然」走上了這條路。

**QW:** 能否談下您的家庭背景和求學經歷？這些經歷與您的問題意識有何關聯？

**ZY:** 我出身農民這一中國最廣大、最底層、最沒話語權的社會階層。這點在我的《傳播與社會》（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1）序言中已有討論。家庭背景與我的問題意識不無關係，但我反對成分決定論和階級標籤。第一，我希望這是一個不帶階級偏見、即不把對方「他者」化的前提下提出來討論的問題；否則就成了來自底層的學者，其問題意識與家庭背景有關，也即是特殊的，而來自上層社會或「中產階級」家庭的學者就可以免談這個問題，進而假定其學術是「客觀」和「普世」的。如果因為我是農民出身，就有了平等的問題意識，那總不能說，因為別人來自上層社會，就自然有了維護不平等社會關係的立場吧。第二，在改革開放語境下，我們熟知1980年代的「傷痕文學」敘事：由於某人是被整的官員、知識分子、和解放前屬於統治階級的家庭背景，因此「反右」和「文革」中無法上高中和大學，所以有了反思制度的問題意識等。問題不在這些個體經歷是否真實，而在於，當這一佔社會少數人口的敘事成為「主流」甚至唯一敘事時，就遮蔽了現實的另一面：難道那上億的工農子女因為家庭階級成分好，就都通過工農兵學員制度上了高中和大學嗎？這是不是也應該成為問題意識之一呢？

我出身農民，但我差點沒資格參加高中入學考試。不是因為我階級身份不好，而是因為當時上高中機會有限，村中權力階層把名額留給了自己子女。這使我不會把階級概念本質化和標籤化，而是注重權力的概念，並在具體和動態的社會歷史關係中分析權力運作。我能升學是有正義感的老師為我抗爭的結果，這使我體認到社會抗爭和下層自我賦權的問題意識。我的高考成績明明可以報北京大學，但我自己、家庭和老師缺乏布爾迪厄所論的「文化資本」，僅因為我沒有英語成績，就不敢把北大填作第一志願。雖然學了新聞，當時內向的性格和在大學裏的農村生身份又使我認為自己不適合當記者。做學問成了我通過高考跨越城鄉鴻溝後融入城市的自我選擇。所有這些都使我對布爾迪厄聚焦的階

級再生產問題有刻骨銘心的理解。而去加拿大留學，意味着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東方和西方、中心和邊緣、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關係、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的關係等都成了我必須面對的問題。

同時，部分由於自己的女性和華人身份，性別關係和種族關係的問題意識逐漸在我的學術中得到強化。當然，城鄉關係的問題意識始終讓我很糾結，儘管這一問題在西方傳播學術，包括批判學術中很邊緣，甚至是盲點。最近，由於深化的環境危機和一個研究中國環境傳播政策的機會，我的生態問題意識得到了強化。但神奇的是，離開農村和離開中國去西方求學之路又在二十多年後最終把我引回我的農村老家做研究。

**QW:** 當下對中國社會主義革命有正負兩種截然對立的評價。作為切身經歷過毛時代和後毛時代的傳播學者，您如何看待中國革命史和毛主義？它們對中國媒體研究有何啟示？

**ZY:** 如果從「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統治」這個最粗線條的歷史唯物主義角度來分析，如果接受中國30多年的改革開放已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1949年前被推翻的階級社會結構這一前提，如果我們進一步接受馬克思主義有關意識形態的階級性的基本立場，那麼，當下對中國革命有兩種評價就不足為奇，而是理所當然的了。要在中國重新建立西方跨國資本、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的統治，就必然要否定中國革命史和毛澤東時代。

在對中國革命的立場上，我欣賞兩位美國學者的評價。一個是哈佛知名學者、我的 *Communication in China* 一書主編裴宜理 (Elizabeth Perry) 的觀點：如果美國革命給了美國人自由，古巴革命給了古巴人民免費醫療等社會福利，那麼，中國革命則致力於把人的尊嚴帶給底層社會的人們，而這在人類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sup>3</sup> 另一位美國學者邁斯奈 (Maurice Meisner) 則從民生角度認為，很少有像中國革命那樣如此大幅度地改善了這麼多民眾生活的世界史事件 (“few events in world history have done more to better the lives of more people”)。<sup>4</sup> 事實上，改革開放成果部分來自於作為中國革命遺產的土地革命和社會革命的「紅利」，包括基



於毛澤東時代建立的基礎教育和普遍醫療的高質量勞動力。

儘管革命是血腥的，革命後果也不一定光明，但革命不會因此就不發生。正如毛澤東所說：「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而革命的暴烈程度與統治者的壓迫程度有一定聯繫。

當然，討論歷史是為了決定未來方向。這個問題對今天媒體研究的重要性無論如何強調都不過分。最可怕的是傳播研究中「去政治化」的政治和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下的「集體政治無意識」，即把西方反共意識形態內化為自己的意識形態，把美國冷戰時代的傳播學當作「客觀」的社會科學，把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有關市場和國家的一系列假設及其政治目標——建立資產階級憲政理想國和與之匹配、但被隱去了其（資產）階級性質的、事實上也只是個「歷史範疇」的「公共領域」——當作規範性研究前提。

**QW: 為何「重返階級」? 當代媒體研究應如何在這方面展開?**

ZY: 我曾在許多英文著作中討論這個問題，中文討論可見2012年的一篇文章。<sup>5</sup>中國新聞傳播研究的歷史悖論是：毛澤東時代社會階級分化不那麼嚴重，可在意識形態和學術領域，階級分析是「政治正確」的框架；改革開放時代，官方有意壓制階級話語，談階級成了「政治不正確」，而正是在此語境下，階級分化却在加深。同時，階級分析這一批判武器被學界放棄。今天的學者要直面階級分化的社會現實，就必須「重返階級」，儘管可能被汗名化。不過要強調的是，就像毛澤東當年對中國社會進行階級分析，目的不是為了批判而批判，而是為了決定革命方向、道路和主體力量一樣，我們今天重構「階級分析」，是為了在新的歷史實踐中推動建設性的批判傳播研究發展，以通過相應的媒體改革政策和媒體實踐來挑戰社會不平等、緩和進而消除階級壓迫和剝削。

但「階級」概念非常複雜，需要細緻地從理論到實證進行研究。馬克思經典裏，階級有客觀和主觀層面，即「自在」和「自為」的層面。客觀是指某社會集團在一定的生產方式中佔有生產資料的狀況。資本主義社會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被分為兩大客觀存在的階級。但該社會集團產生階級意識，從「自在」向「自為」轉變，又是個主觀的過程，也就是在具體社會歷史過程中的「階級

形成」過程，而傳播在此過程中的作用最為關鍵。這是階級分析的一般的框架，但放在中國今天的語境下，它就非常複雜。

首先，在當下的世界體系中，階級(class)總與「民族」(nation)有一定互構關係。歷史上，中國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的邊緣位置決定了整個中華民族做為被壓迫民族的「階級」地位和以「民族獨立」為主要訴求的中國革命的合法性。今天中國還處在不平等的國際地位中，整個民族的「階級」地位沒有根本改變；同時隨着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中國與全球資本主義整合，階級的「跨國性」凸顯。西方有學者不僅發展了「跨國資產階級」概念，<sup>6</sup>且認為，跨國資產階級掌控媒體和學術，在一定程度上有了「自為」的階級意識，而「跨國工人階級」則基本處於「自在」狀態。因此今天進行階級分析，就應研究在「中國崛起」和(社會)「底層塌陷」語境下的階級和民族國家關係，包括傳播在其中的作用。

其次，由於農耕社會傳統，中國農民問題的重要性在世界史上屬罕見，不是靠馬克思經典就能正確解決。歷史上，是毛澤東對農民階級的分析 and 把中國農民鍛造為革命階級主體的實踐使中國革命挑戰了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把「工農聯盟」定義為自己的階級基礎。對中國來說，如果階級問題在外部與民族國家問題有密切關係，那麼它在內部與城鄉關係問題就密不可分。正如我和呂新雨在我們的訪談中討論的那樣，面對城市化、工業化，面對資本主義現代性的政經、社會、文化和生態危機，重新認識後革命中國社會的農民階級及其主體性，並在構建良性城鄉關係的框架下討論實現新工農聯盟的可能性，不僅對中國，而且對世界有深遠意義。<sup>7</sup>這需要我們不但批判傳統馬克思主義在農民問題上的西方中心主義和東方主義，而且要全面反思和批判作為美國主流傳播學理論基礎的現代化理論，尤其是把農民等同於愚昧 and 把「傳統社會」等同於「落後」的線性史觀。

再次，階級問題與社會性別以及少數族裔和地域問題有複雜的重疊交叉關係。在改革時代的中國，階級分化與性別不平等同時加深，相互影響，從「女性優先」下崗到「世界工廠」的打工妹，從農村留守婦女到性工作者，從邊遠地區被拐買的女性再到「小

三」現象，無不展示出性別壓迫與階級壓迫是如何疊加在一起的。同時，階級矛盾常以民族矛盾的形式出現，全球化又使民族問題與跨國階級構建糾結在一起。用哈維<sup>8</sup>的概念，國家一邊按「市場邏輯」吸納海外「炎黃子孫」的金融和人力資本，一邊按「地域邏輯」打擊境內外的「藏獨」、「疆獨」勢力。

最後，最重要的是，當下中國社會的「後革命」性質和某些「後現代/後工業」特性為在研究中「重返階級」造成了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障礙，但也提供了豐富的理論和歷史遺產以及生動的現實資源。由於革命遺產的存在，階級分析框架的批判性在中國非同一般。比如大家清楚，在一個推翻了「官僚資產階級」、「買辦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的後革命社會，重提這些階級或階層的「新生」和媒體在這些階級形成過程中的角色意味着什麼樣的批判力度和對政權合法性衝擊？相反，在一個官方意識形態並未放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不談馬克思意義上的階級，而大談韋伯意義上的「中產階級」又意味着什麼？又如「農民工」階層，更是中國社會特有的現象，也是當下傳播與階級分析焦點問題之一。同時，信息、文化和媒體產業作為「後現代/後工業」經濟中的支柱產業又使這些領域同時有了傳統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雙重屬性，在階級形成的客觀與主觀過程中同時起作用。「知本家」們的經濟和意識形態角色正是這種現象的集中體現。也正因此，「重返階級」在傳播領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重要、敏感和具有挑戰性。

**QW:** 您也開始介入三農問題和「新鄉土主義」的討論。為何傳播研究在三農議題上長期「缺席」？傳播學的介入可為三農議題帶來哪些新的可能？

**ZY:** 中國傳播研究在三農議題上長期缺席，與其西方中心主義偏向有關，與傳播產業商業化進而強化城市中心主義有關，也與國家總體發展政策的偏頗相輔相成。這也是從西方引進的傳播學脫離中國社會實際的重要表現之一。首先是理論範式問題。我在《學刊》第12期訪談呂新雨教授時提到，農民與鄉村社會是美國主流傳播學中「傳播與發展」範式的主要研究議題。受其影響，中國也有些

關於傳播與農村現代化問題的研究，不過基本只在美國的現代化理論框架內進行，把農民當作既定現代化價值的改造對象和現代傳播技術的推廣對象。然而，這種理論框架來自冷戰意識形態，這種研究不僅不能解決三農問題，且與其所依附的現代化理論一樣，成了產生問題的根源之一。同時，批判學派在中國流傳過程中更是複製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城市中心主義偏頗，在農民問題上幾乎是盲點。另外，中國傳播研究日益依附媒體產業，也造成忽視三農。研究視角的問題更與傳播研究者的主體性和「階級意識」有關：在告別了以農民為主體的革命之後，中國傳播學「主流」遠離「三農」，這很自然。畢竟，不管是西方現代化的框架還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框架，農民作為一個階級是要被消滅的。

然而如呂新雨所說，從1920、1930年代的共產黨人與晏陽初、梁漱溟等鄉村建設派到今天重新出現一批做鄉村運動的知識分子，例如溫鐵軍，不同時期中國知識分子都有「到農村去」的歷史動機。<sup>9</sup> 傳播領域的知識分子也不例外。隨着中國傳播研究走向成熟，三農議題會更顯重要。傳播學者可以在現代農民的主體性、媒體和文化在農村社會轉型中的地位和作用、鄉土文化和農耕文明的生命力、傳統知識的意義及其創新和傳播等問題的研究中，作出應有貢獻。

我自己對三農問題的認識也有個不斷深化的過程。最先在博士論文中批判媒體商業化導致忽視農村，後分析電信普遍服務和「村村通」工程，再到引用黃宗智觀點指出西方「公共領域」和「市民社會」概念對中國「鄉土社會」研究的侷限性，最後在2009年把在傳媒大學的長江學者項目定為「傳播、文化、與中國的城鄉協調發展」。

對我來說，從城鄉關係視野來研究當下中國傳播，不再是由於農民出身所「自然」產生的問題意識，不是知識分子面對「底層」的悲天憫人、甚至是居高臨下的同情和「關懷」，也不僅僅是寄託「鄉愁」，而是事關中國發展道路的最基本的中國傳播政治經濟學和中國文化研究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我的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價值理性和情感理性是一致的。回到前面的階級分析框架，

這是事關當下中國主導階級是把西方資產階級當摹本，把中國型塑為實現本階級利益的向外擴張型的資產階級國家，還是在新形勢下，尋找「工農聯盟」和「城鄉互助」新形式、從而真正走出一條社會主義道路的大是大非問題。在理論層面，也有學者已經指出，對農民的主體性和他們作為直接生產者的重新認識，有利於糾正馬克思主義中的東方主義和產業工人中心主義傾向。

**QW:** 為何您近年提出「跨文化傳播政治經濟學」(trans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相較於傳統分析框架,「跨文化」概念有何增值(added value)?

**ZY:** 本期《學刊》正好發表我的相關文章，所以只做點補充。「跨文化政治經濟學」概念由我和當年在加州的印度裔同事葆拉·查克里巴蒂在2008年合編的*Global Communications: Toward a Trans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一書中初次提出。不過對「跨文化政治經濟學」這一翻譯我始終不滿意。我們創此概念不是為了標新立異，而是認識到了西方，主要是英美傳播政治經濟學在理論和方法上的侷限，尤其是其在研究非西方國家和西方內部的種族、性別問題上的侷限，從而希望豐富和修正現有的傳播政治經濟學。

我們合作還有學術政治的原因：我比葆拉早一年到加大聖地亞哥分校工作。這是批判傳播研究的重鎮，能連續兩年聘任兩位少數族裔女學者，也是這個系在學術政治上踐行批判立場的體現。但是，系裏為我們分別指定的帶我們的兩位老資格同事有間隙，所以葆拉來了以後，我跟她談的第一點就是，作為有「第三世界」情結的學者，我們不能「再生產」各自「導師」之間的間隙。在此基礎上我們蘊釀合作，且在項目開始我就以姓中以「Z」開頭的身份主動提議，我們的合作成果以字母順序署名。在編書過程中，我們還確立了一個原則：不是慕名找學者，而是找正在對非西方國家和西方國家內部被邊緣化的傳播問題有實證研究的青年學者。結果我們當時的作者中，沒有一人有副教授以上職稱。

講這一背景，是為從一個側面回答此框架有何「增值」：對我來說，「跨文化」意味着新的全球傳播知識生產的理念和機制，這是一種在現有知識生產框架內盡可能包含國際主義團結、平等、

且基於「第三世界」或「南方」(也包括「第一世界」中的「第三世界」、或「北方」中的「南方」)視野的知識。當然這不意味着我們只研究非西方現象，而是從徹底的反帝和反霸權的視野關注全球傳播，比如「反恐」戰爭中，北美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框架是如何被調用起來以「拯救阿富汗婦女」的名義為帝國目標服務的。相對過去「西方理論、其它地方提供案例和經驗」的套路，我們不把「理論」和「案例」分開，而是追求理論與實證案例結合的研究。所以我們書中每篇都既有理論意義，又有扎實實證研究。再者，我們有意在批判框架下追求政治經濟分析和文化研究的結合。第四，相對傳統政治經濟學對階級問題的側重，我們強調民族國家、種族、性別等層面的問題，並且強調這些因素間的複雜關係。

最後，也是最關鍵的是，我們強調歷史的開放性、現實的多重可能性，尤其是不同政治經濟和文化形式在碰撞的過程中產生新的、解放性的文化形式的可能性。也就是說，在批判「文化帝國主義」的同時，我們不但強調被壓迫民眾的抵抗能力及其在抗爭過程中產生新文化和生活形式的可能性，而且強調這些抵抗甚至對抗性的文化形式對帝國中心的文化轉型意義，而這正是“transcultural”中“trans”這一詞根的“transformation”意義。

最後這點有點抽象，因為我們要不把自己定位為「受害者」，要不想像自己是「接軌者」或「追趕者」。融入國際社會是中國許多學者的目標。但我們忽略了自己改造世界和書寫歷史的能力。回到關於中國革命的討論，除了對國內的意義外，中國革命和後續的抗美援朝等歷史事件還激勵了第三世界的反帝、反殖、民族獨立運動，甚至激勵了第一世界內部下層民眾和進步社會力量為平等和公正而進行抗爭，包括美國的黑人民權運動。從這個意義上把“trans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翻成「文化轉型傳播政治經濟學」也許更貼切，但可能太拗口。總之，挑戰歷史終結論，挑戰西方中心主義知識、強調中心和邊緣的互構關係和下層/邊緣國家、民族、階級、種族的主體性是我們這個框架所強調的。至於是「學」還是「研究」，這在中文語境裏好像很重要，但在英文裏基本沒區別。

**QW:** 您不久前在傳媒大學組織工作坊譯介《馬克思回來了》特刊<sup>10</sup>。完整地將外國傳播學期刊的一整期譯為中文，在華語傳播學界可能是首創。為何這麼做？

**ZY:**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馬克思(又一次)復活了，有關「共產主義」理論的書出了好幾本，傳播學也不例外，出版了《馬克思回來了》特刊(*Triple C Special Issue: Marx is Back*, 2012)。我曾被邀請投稿，但放棄了。這本專刊有近30位學者討論馬克思原著中的思想對今天傳播研究有何意義，其中沒有任何華人學者的貢獻。但中國可是宣稱並力圖發展馬克思主義新聞傳播學的國度啊！看着我在加拿大的博士生拿着政府獎學金辦《資本論》讀書組，而許多來自中國的學生和學者則不知「自在」和「自為」階級，我很有感慨。

選擇這一特刊做翻譯工作坊，一來為了重新介紹馬克思，也想向國內批判地介紹西方馬克思主義傳播研究前沿。更重要的動機是基本學術訓練和文獻述評能力的培養：讓年青學者從一字一句的翻譯工作中得到嚴謹的學術邏輯涵化，並通過工作坊交流精讀和翻譯體會，而後寫出「導讀」文字與譯文一起發表。在操作過程中，我們強調學術梯隊的作用：由最年輕的學者，主要是博士生，做最初的翻譯，由資深點的青年教師做校譯。另外，由於這本特刊的一些文章作者不是什麼「大師」，而是普通的博士生——包括我在加拿大的博士生，我們希望翻譯過程也是一個對西方學術從仰視到平視的過程。

總之，這個工作坊是與「跨文化傳播政治經濟學」學術立場一致的有「學術文化轉型」取向的學術實踐。我們重視內容，也重視知識生產形式的創新和新的學術文化的培育。這是我建立的中國傳媒大學「傳播政治經濟研究所」和由呂新雨教授主要負責、我也參與其建立的復旦大學「當代馬克思主義新聞傳播研究中心」以及臺灣馮建三教授的合作項目。我們既沒有把年輕學者，尤其是學生，簡單地當作學術翻譯的勞動力，也沒有像有人批評的那樣，不加批判、甚至不合時宜地引入西方馬克思主義傳播研究。相反，我們特別要求每位導讀寫作者就文章中可能有的西方中心主義問題和對中國的相關性問題提出看法。所以，這個「譯站」同時

也是大家知識旅程中加油充電的「驛站」。這期專刊是我們的「傳播譯站」項目的初次實踐，我們正在總結經驗教訓，做第二個翻譯工作坊的工作。

**QW:** 斯邁思在〈自行車之後，要什麼？〉中提出：「今日資本主義的運作仰仗於對資本主義消費關係的發展」<sup>11</sup>。而您在斯邁思獎領獎發言時說：「只有生態社會主義 (Ecological Socialism) 才能拯救中國和世界」。生態社會主義或曰生態馬克思主義，跟傳統馬克思主義相比有何不同？

**ZY:** 這正是2013年第12期的美國《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 雜誌討論的問題。當然它跟什麼是「傳統馬克思主義」有關。就我而言，兒時有對農村生態和非消費主義生活方式的記憶，雖然那並非一個未被破壞的伊甸園。大學時代，我不僅讀了馬克思早期著作中有關人和自然關係的論述，而且讀了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留學期間，我接觸了斯邁思對消費資本主義的批判，還深受當時系裏另一位批判傳播學者威廉雷思 (William Leiss) 的影響。他是馬爾庫塞的學生，我剛到溫哥華不久就讀了他的《主宰自然》(Domination of Nature) 一書，其內容是關於西方現代性和資本主義對自然的統治。所以對我來說，生態社會主義或生態馬克思主義一直是個自然而然的知識框架，儘管這兩個詞的流行是過去十多年的事。

按《每月評論》主編福斯特 (John B. Foster) 的分析，<sup>12</sup> 在西方馬克思主義傳統中，馬克思的辯證法只被用到社會領域，沒用到人和自然的關係中去，而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被認為是錯誤的。這正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往往把馬克思與恩格斯分開、西方馬克思主義與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的馬克思主義相區別的重點之一。但過去十幾年來，部分由於全球生態危機加深，不但馬克思關於生態問題的分析被重新發現，且如福斯特強調，西方馬克思主義傳統中把馬克思的辯證法只用於社會分析並拋棄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是有問題的。至於在中國，當「科學社會主義」變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後者又實際上變成資本主義「補課論」，且中國在實際發展道路中以生態為代價成為世界工廠的時候，中國的發展就與任何意義上的生態社會主義南轅北撤了。可喜的是，官



方理論已把生態問題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由於傳播在維繫消費主義意識形態中的核心地位，也由於媒體和傳播體系本身也是高耗能和產生高污染電子垃圾的產業，生態視角從來沒這麼重要過。

**QW:** 與其他人文社會科學對社會議題的介入相比，傳播學在重大社會問題討論中經常「缺席」或「失語」。這種狀況應如何改善？

**ZY:** 這是個經常被問到的問題，也是個不可能一下子解決的問題。畢竟，傳播是門年輕學科。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我想應是去媒介中心主義，跳出傳播研究傳播。第二，重新思想解放，別讓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侷限自己的學術想像力。由於特殊原因，新聞傳播領域好像比其他的人文社科領域更受「國家對社會」，「自由對控制」等簡單二元論框架的禁錮；第三，象呂新雨所強調的<sup>13</sup>，我們應反思社會科學的方法論，重構學術倫理，深入社會和民間，發現真問題，做接地氣的研究。

我在2009年寫過中國傳播研究轉型的五個“R”或5個「重新」，即「重新根植於歷史」，「重新嵌入社會」，「重新定義主體」，「重新關照意義與社區」，「重新發現烏托邦」。<sup>14</sup> 在《傳播與社會》最後一章，我也就如何開拓中國傳播研究新理論想像提出了一些思路，<sup>15</sup> 在此就不重複了。

**QW:** 如何看待傳播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您在國內已從事了多年的相關研究與教學實踐。今年又在中國傳媒大學創立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所，還有2013秋季開始的西蒙弗雷澤大學和中國傳媒大學國際傳播雙碩士學位項目。對該研究領域的未來您怎麼看？

**ZY:** 傳播政治經濟學在中國處於既傳統又前沿、名為「主流」實則非常邊緣的境地。由於官方未拋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也由於當下的意識形態分歧，傳播政治經濟學往往因其馬克思主義理論淵源而被認為是迎合官方，遭到汙名化，雖然做為官方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和作為批判學術的馬克思主義不是一回事。也有學者尚未充分理解傳播政治經濟學及其內部的豐富性，就草率地下結論，強調其「整體」的弊端——只批市場，不批國家、只研究宏觀，不研究微觀、只重結構，不重主體性等等、甚至扣上「莫須有」的陰謀論帽子。還有學者按本質主義的東西方二元邏輯把它

看作是「西方」的「新」理論而認為不適合中國。當然，傳播政治經濟學作為一個學術傳統，本身有其歷史和文化的侷限性，而它在中國傳播過程中的臉譜化問題和一些學者的浮躁更強化了其侷限性。最後，即使沒有意識形態的抵觸，由於官方的「鄧三科」教育偏離了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和方法論的教育，也更由於馬克思主義在事實上的邊緣化，在中國講述傳播政治經濟學也會碰到許多基礎理論知識薄弱的問題。

不過，從我在國內講學的經歷來看，不但傳播政治經濟學有發展空間，而且近幾年的情況令我振奮。我感謝那些給我講學空間的學術同仁，更感謝那些敢於衝破意識形態牢籠的青年學子。傳播政治經濟學不是萬能，但沒有它而去研究傳播，正如麥克切斯尼所說，就象帶着手套彈鋼琴。傳播政治經濟學是一套理論，一種方法論。它更是與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相關的開放性學術實踐。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前景與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前景相輔相成，而關鍵在於青年，在於該理論能否在他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過程中有意義。

我很幸運，不但有機會在中國傳媒大學建立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所，而且成功開辦了中加雙學位碩士班，使我能在教學中實踐我的「跨文化傳播政治經濟學」理念。我在實踐中碰到過各種問題，但從未有過如此令我滿意的教學經歷：這是真正的跨文化(transcultural)體驗。

**QW:** 最後，您對有志從事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青年學者有何建議？學術真能改變世界嗎？

**ZY:** 走自己的路，得出自己的判斷，讓人家說去吧。不要太功利，不要機關算盡，不要只知道一點皮毛就高舉起傳播政治經濟學旗幟，也不要還沒找導師商量就認為他(她)會反對你走上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道路。當然，絕對不能好高騖遠，如果真有興趣，就從加入我們的下一個「傳播譯站」工作坊開始吧。

至於最後一個問題，就象我在十多年前的一個學術訪談中說過的那樣，我堅信學者有秉承社會良知，展示思想力量的天職。

**QW:** 感謝您與我們學刊的讀者分享您的見解。

## 趙月枝著作選

- 趙月枝 (2011)。《傳播與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分析》。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
- Zhao Yuezhi (2011). *Chuanbo yu shehui: Zhengzhi jingji yu wenhua fenxi*. Beijing: Zhongguo chuanmei daxue chubanshe.
- 趙月枝 (2010)。〈「向東看，往南走」：開拓後危機時代傳播研究新視野〉。《中華傳播學刊》，第18期，頁3-30。
- Zhao Yuezhi (2010). “Xiang dong kan, wang nan zou”: Kaituo hou weiji shidai chuanbo yanjiu xin shiye. *Zhonghua chuanbo xuekan*, 18, 3-30.
- 趙月枝 (2008)。〈選擇性新自由主義的困境？——中國傳播政治的轉型〉。《二十一世紀》，第107期，頁4-14。
- Zhao Yuezhi (2008). Xuanzhexing xin ziyou zhuyi de kunjing? Zhongguo chuanbo zhengzhi de zhuanxing. *Ershiyi shiji*, 107, 4-14.
- 趙月枝 (2007)。〈國家、市場與社會：從全球視野和批判角度審視中國傳播與權力的關係〉。《傳播與社會學刊》，第2期，頁23-50。
- Zhao Yuezhi (2007). Guojia, shichang yu shehui: Cong quanqiu shiye he pipan jiaodu shenshi zhongguo chuanbo yu quanli de guanxi. *Chuanbo yu shehui xuekan*, 2, 23-50.
- Zhao, Y. (Ed.). (2014). Communication and global power shifts. special section of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8. Retrieved February 28, 2014 from: <http://ijoc.org/index.php/ijoc/article/view/2631>
- Zhao, Y. (Ed.). (2012). Communication and class divide in China, special issue of *Javnost*, 19(2).
- Zhao, Y. (2008). *Communication in china: Political economy, power, and conflict*.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Zhao, Y. (2007). After mobile phones, what? Re-embedding the social in China's “digital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 92-120.
- Chakravartty, P., & Zhao, Y. (Eds.). (2008). *Global communications: Toward a trans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Hackett, R. A., & Zhao, Y. (Eds.). (2005). *Democratizing global media: One world, many struggle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Zhao, Y. (1998). *Media, market, and democracy in China: Between the party line and the bottom line*. Urbana and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Hackett, R. A., & Zhao, Y. (1998). *Sustaining democracy? Jour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objectivity*. Toronto: Garamond Press. 中文版：羅伯特·哈克特，趙月枝(2010)。《維繫民主？西方政治與新聞客觀性》(沈薈，周雨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 注釋

- 1 兩個獎項分別為民主傳播聯合會(UDC, Union for Democratic Communications) 2013年度達拉斯·斯邁思獎(Dallas Smythe Award)以及國際傳播學會(ICA) 2014年度「C·埃德溫·貝克」獎(C. Edwin Baker Award)。
- 2 Smythe, D. W. (1994). After Bicycles, What? In T. H. Guback (Ed.), *Counterclockwise: Perspectives on communication* (pp. 230–231).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3 裴宜理，「崛起的意義——把人的尊嚴帶給底層社會」，[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hwkzg/article\\_2013051583423.html](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hwkzg/article_2013051583423.html)。
- 4 Meisner, M. (1999).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World History. London. LSE Asia Research Center Working Papers 1. Cited in Lin, C. (2013). *China and Global Capitalism* (p. 48).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5 趙月枝(2012)。〈全球化背景下的傳媒與階級政治〉。《文化縱橫》，第3期，頁44–49。
- 6 Sklair, L. (2001). *The transnational capitalist class*. Malden: Blackwell.; Robinson, W. I. (2004). *A theory of global capitalism: Production, class, and state in a transnational world*.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7 呂新雨(即將出版)。《學術、傳播與公共性》。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六點分社。
- 8 Harvey, D. (2005).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9 同7。
- 10 Fuchs, C., & Mosco, V. (2012). Introduction: Marx is back—the importance of marxist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critic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today. *TripleC: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 Critique*, 10(2), 127–140.
- 11 同2。
- 12 Foster, J. B. (2013). Marx and the rift in the universal metabolism of nature. *Monthly Review*, 65(7), 1–17.

- 13 同7。
- 14 Zhao, Y. (2009). Rethinking Chinese media studies: History, political economy and culture. In D. Thussu (Ed.), *Internationalising media studies* (pp. 175–195). London: Routledge.
- 15 趙月枝 (2011)。《傳播與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分析》。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頁280–295。

### 本文引用格式

邱林川、王洪喆 (編) (2014)。〈東西方之間的批判傳播研究：道路、問題與使命〉。《傳播與社會學刊》，第28期，頁1–21。

